

書評

Gert Albert, Agathe Bienfalt, Steffen Sigmund and Claus Wendt (ed.): *Das Weber-Paradigma: Studien zur Weiterentwicklung von Max Webers Forschungsprogramm* (Tübingen: J.C.B. Mohr, 2003), 406頁.

林端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一、海德堡的韋伯傳奇

韋伯（1864–1920）傳奇的一生，與美麗的小城海德堡，以及著名的海德堡大學息息相關。他生前住的奈卡河邊的洋房——韋伯故居（Weber-Haus），成為大學附設的外國學生學習德語的中心；八十多年來，他還長眠在海德堡市區的墓園裏。

我們可以說，這本書跟海德堡的韋伯傳奇有關，但是，我們更可以說，這本書跟海德堡的“韋伯學”，海德堡大學的韋伯傳奇有關。顧名思義，這本書名為 *Das Weber-Paradigma: Studien zur Weiterentwicklung von Max Webers Forschungsprogramm*（韋伯典範：韋伯研究計劃後續發展的研究），談的就是過去幾十年來，以韋伯研究重鎮——海德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為中心，兩位世界著名的韋伯專家 M. Rainer Lepsius 與 Wolfgang Schluchter 所聯合領導的韋伯研究，他們承先啟後，在韋伯學說的基礎上，開展出一個韋伯研究計劃後續發展的典範。



這是一本論文集，用來慶祝這兩位傑出的韋伯專家的壽辰：Lepsius七十五歲，Schluchter六十五歲。前者已經退休，後者仍然十分活躍，擔任海德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講座教授。一方面是祝壽，二方面是總結過去的韋伯研究成果，2003年四月十日到十二日，在海德堡大學國際學術論壇舉辦了的一場精彩的學術研討會，這本書就是這個研討會的成果。四位編者Gert Albert, Agathe Bienfalt, Steffen Sigmund and Claus Wendt都是四十歲上下的海德堡社會學研究所的年輕新秀，藉著這本書的編輯，展現了接棒的可能性，希望在這兩位先行者的韋伯研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對韋伯學說與當今現代與後現代社會的重要課題作深入的探討與研究。全書除了導論之外，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具有學術發展史的意義，這一部分的名稱是“海德堡的韋伯典範”，裏面包括第一篇是德裔美籍的韋伯專家Guenther Roth的文章〈海德堡的宇宙政治的社會學〉，再來是Lepsius的文章〈韋伯典範的特性與潛能〉，然後是Schluchter的〈行動秩序與文化：韋伯研究計劃的基本特性〉。第二部分的文章，其名稱是“科學理論與價值理論”，裏面包括三篇文章，分別是著名的批判理性主義(Kritischer Rationalismus)健將，與Karl Popper齊名的Hans Albert的〈世界觀、科學與實踐：韋伯的科學與價值學說的考察〉，再來是曾擔任德國哲學會會長的Hebert Schnädelbach的〈價值的語言〉，第三篇是義大利韋伯專家Pietro Rossi的〈世界史與跨文化比較〉。第三部分的名稱爲“行動與行爲”，裏面第一篇是Zenomas Norkus的〈韋伯概念建構中的情境相關的與程序的行動理性〉，第二篇是德語世界研究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著稱的Hartmut Esser的〈價值的理性：行動類型與社會學解釋的模型〉，第三篇則是Harald Wenzel的〈目的理性：韋伯與杜威〉。第四部分名爲“文化與生活導引”，裏面包括四篇文章，分別是Hans G. Kippenberg的文章〈宗教共同體：世界的意義問題工作與



群體性的社會行動的需求相會流之處》，還有Friedrich Wilhelm Graf的〈因為靠近而產生的距離：在新的Troeltsch的研究中所看到的韋伯典範〉。第三篇則是接替Schluchter擔任韋伯出生地Erfurt 大學韋伯學院 (Max Weber-Kolleg) 院長的Hans Joas的〈韋伯與人權的興起：文化創新的研究〉，第四篇則是同樣出身海德堡的Hans Peter Müller的〈文化與生活導引：透過工作？〉。第五部分則是以“制度與秩序”為名，裏面也包含四篇文章，分別是同樣出身海德堡的新秀Thomas Schwinn的〈全球化的現代中的文化比較〉，其次是以色列著名的Shmuel N. Eisenstadt〈現代的制度秩序：韋伯觀點下的多元現代〉，第三篇則是來自漢堡、有關韋伯著作甚勤的Stefan Breuer的〈韋伯的政黨社會學與法西斯主義的問題〉，第四篇則是現任德國社會學會會長的Karl-Siegbert Rehberg的〈個人與制度：韋伯思想中的典範結構的考察〉。整本書總共四百頁左右，由這十七篇論文來看，的確結合了德語世界大部分重要的韋伯專家，而且討論的課題從科學理論、價值理論到行動、行爲、生活導引、文化、制度與秩序，由內而外，由微觀到宏觀，相當紮實地反應了德國韋伯學研究的重要面向，而且也與實際的現代與後現代的課題（理性選擇、全球化等）息息相關。由此可見，在韋伯研究典範的繼續發展與傳承之上，海德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扮演了關鍵性的重要角色。以下我們簡單討論一下整本書的內容。

二、海德堡的韋伯典範

第一部分是“海德堡的韋伯典範”，編者們認為“韋伯典範”主要是在二十世紀的初期在海德堡誕生的，韋伯作品的形式與實質內容，其實跟當時韋伯在海德堡的文化氛圍與週遭環境息



息相關。因此，二次戰後的韋伯研究的詮釋重鎮又回到海德堡，可能也不是偶然的。這本書所獻給的兩位韋伯專家，他們在六零年代與七零年代先後來到海德堡。在他們的努力之下，一方面承擔韋伯全集主編的工作，一方面又創立了所謂“海德堡的韋伯客座教授”的講座課程，因此掀起了德國境內以及國際韋伯研究的高潮。也就是在這種狀況之下，德裔美籍的Roth，也就是韋伯重要著作《經濟與社會》的主譯者，也被邀請到海德堡擔任客座教授，他常常住在Schluchter的家裏，所以培養了很深的公私關係。Roth自己經常橫跨大西洋兩岸，是韋伯研究在美國復興、又傳回德國的重要人物（另一個是同樣出身德國的Reinhard Bendix），他的文章基本上對於“韋伯學說的研究史”有重要的指標作用。喜歡歷史社會學的他，近年來研究韋伯家族歷史，為“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找尋韋伯家族史上的根據，原來韋伯一家，個個是企業家，分佈英國與歐陸等地。在本書中，他回顧海德堡大學的社會學發展，一定程度美國化與國際化，而有著宇宙政治的取向，這跟韋伯是息息相關的。尤其是二次戰前畢業於海德堡Talcott Parsons，曾就學於當時任教於海德堡經濟系的韋伯的弟弟Alfred Weber，把韋伯新教倫理的研究引進美國，Parsons本身成為結構功能論與現代化理論的大師後，連帶著也使得德、美之間的交流，藉著韋伯在海德堡開花結果。更有趣的是，一九七九年他回到海德堡接受榮譽博士的學位，轉到慕尼黑進行演講的時候，他跟韋伯一樣，都是在慕尼黑突然因病死亡，這種命運上的巧合，無疑地又是社會學史上的一段重要的插曲。

Lepsius的作品討論韋伯典範的特性與潛能，他強調韋伯是把行動者的社會行動、行動空間的結構化與行動取向的意義關聯脈絡中形成出來，所以他認為這三個面向的相互運作，是韋伯的研究計劃主軸。而Schluchter的作品，則討論韋伯研究計劃裏面的行動、秩序與文化，他認為韋伯很重視“規則導引的行動”的理



論，因此在這個基礎上，他與盧曼的系統理論區分開來：理解（Verstehen）的概念、意義的概念、相互論、雙重的偶連性、多層次的分析以及一個有言說能力與行動能力的行動者。因此在行動理論裏面，就要區分溝通取向的行動與利用取向的行動，有別於個體經濟學裏的利用計算的“遵守規則”，韋伯的研究計劃放棄了嚴格的法則式的（nomologisch）命題，而強調所謂的“詮釋的假設”，這種假設雖然允許行動過程的普及化，但同時考慮到自然法則與人類的行動規則性之間的差異，詮釋的假設是啟發式的理想化，將可能的行動過程（只有在極端的狀況下才會跟真實的行動兩相符合），這些假設化繁為簡，是理念型的建構。也正因為如此，韋伯才能克服個體經濟學理性概念工具式的狹窄性。因為所謂“理性的行動”在這個背景之下，遠遠超過單純的利用極大化的策略考量，它也可以是一個來自義務概念的行動，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價值理性”才能在“目的理性”之旁成為同等重要，完全有理性化能力的、有詮釋能力的行動取向。在這裏又把韋伯的理性概念，與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相互比較，後者過度強調溝通理性的潛能，韋伯透過一個批判主義取代了言說理論的認知主義，一方面韋伯堅守我們的理解的理性的能力，二方面並不否認溝通理性的原則限制；韋伯認為主宰社會世界的不是共識，而是理念與利益之間的（形式規則化的）鬥爭，韋伯的基本人類學的引導式的動機是：強調一個文化人自由的、自覺的人格，而他對世界採取特定的態度，賦予世界特定的意義。

三、科學理論與價值理論

在第二部分裏談的是科學理論與價值理論，討論韋伯的“科



學論文集”，身為文化人從事科學工作時，他會運用“理念型”、“方法的個體主義”、“解釋的理解”以及“價值自由”，這些關鍵字，不只是方法上的研究工具，而且是韋伯思想相關的規範式前提，因此，科學理論的考察與價值理論的考察，這兩者息息相關。編者們認為，下列問題引人深思：我們有沒有可能針對韋伯有關科學理論與行動理論的陳述，既斷簡殘篇又多重意義的情況下，來加以討論呢？或者不是加以批判，而是像 Schluchter 一樣，作進一步的解釋後，才能獲得確切的概念？更困難的是韋伯的價值理論，到底韋伯是一個相對論的立場，還是一個決定論的立場（像 Habermas 與 Hennis 所強調的），還是像 Schluchter 一樣，認為韋伯的責任倫理跟康德的禁欲的人格理論，有著選擇性的親近關係？

Albert 在這本書中，把韋伯跟他的好友 Popper 相提並論，在〈世界觀，科學與實踐〉的文章裏，他認為他們兩者都是批判的康德主義者，其目的都在針對我們的知識與價值可能產生錯誤知覺的特性上，而行動科學的基本概念必需以此為起點。這種批判式的可犯錯主義，首先展現了其理念型概念建構的特色，韋伯藉著它克服了抽象的經濟理論的制度性盲目。同樣地，韋伯批判式的“責任倫理”也是具有可犯錯主義的特色。然後，認定價值與價值領域的“絕對多神論”就導致了透過一個“價值討論”所產生的價值批判的必要性。而這個跟世界採取批判的立場，也會形成評價的理性化與客觀化的媒介，而不需要落入一個可以避免的，介於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難題。儘管這種韋伯的可錯誤主義帶著形上學批判的生產性，但是 Albert 認為韋伯有一個基本的、不一致的現象：韋伯嘗試將基礎理論的客觀性的努力揭露為幻覺，但是這會導致一個有疑問的、免除批判的建構，這使得科學的地位價值受到損害。而在科學理論上，放棄法則式的命題是其弱點，當韋伯把古典經濟學的“法則”只是當成啟發性的框架來



加以使用的時候，韋伯放棄了他有關經驗檢證的訴求。因此韋伯也沒有建構了一般意義的行動理論，而只是建構了一個啟發式的分類框架，需要在後來加以補充。此外，韋伯在價值理論裏與客觀性的距離也可能有些問題，韋伯以所謂相互主觀的批判來取代客觀的基礎，雖然考慮到價值與事實在認識論上的差異，但韋伯也因此付出了代價，把“最後的價值標準”，這是每一種價值判斷的基礎，他放在那裏而未加質疑。作者認為這存在著不小的危險，有可能失去批判的可靠基礎，而導致一個道德倫理上的教條主義。而另外一位哲學家Schnädelbach的文章“價值的語言”，也正好討論這種道德保守主義與教條主義的潛在危險，他認為韋伯的價值理論與十九世紀的“價值修辭學”的這種類似性，會導致“文法上的物化傾向”，將價值歸諸形上學的虛假客觀性與權威。

義大利韋伯專家Rossi，他的文章〈世界史與跨文化比較〉，Rossi認為韋伯與Oswald Spengler的“選擇性的親近”：兩者都強調意義關聯的多元性與個體性之無法跨越的特性，兩者都在德國歷史學派的脈絡下，反對“流出論”(Emanatismus)與實證論，而強調無可迴避的、不同的“民族精神”的獨特性，重視文化之間差異的、首尾一貫的、“多中心”歷史觀念。在這樣的一個精神背景之下，韋伯最核心的興趣是在討論“西方的理性主義”的獨特性，而這種獨特性是透過形式理性化與分殊化來展現其特色的。而所謂韋伯的“典範”可以進一步發展的問題是：韋伯是否將西方當成一個獨特的、無法比較的“歐洲奇蹟”而加以擡高化、特權化，在進一步全球化的浪潮下，這種主張可以再保持下去嗎？相反的問題是：“宰制現世的理性主義”變成是一個普遍的、統一的系統強制力量，以及歐洲的形式理性的例外發展，在日漸無可忽視的宗教與倫理的團體的意識型態的重新復興的情況下，是否要讓位給後者呢？時代的鉅輪不斷前進，長江後浪推



前浪，韋伯說得好，科學研究者的命運是我們注定會被超越，這句話用在韋伯身上也不為過。

四、行動與行爲

在這部分的討論中，Norkus比較韋伯的行動理論以及理性選擇派的代表人物Herbert Simon，對後者來說，韋伯的行動理論缺乏了法則式的成分，但是韋伯的理論卻可以對理性選擇派在認知心理學上的修正可以有所貢獻。Esser重建了所謂價值理性的行動，把他放在一個普遍的行動理論裏，可能有助於理性選擇派秩序問題的解決。在此，韋伯的行動概念缺乏法則式的成分，被Norkus和Esser看成是弱點，而在Schluchter來看卻是強項，因為範圍比理性選擇派的行動更為廣泛。

Wenzel認為韋伯目的理性的行動的概念，可能走過頭了，他把韋伯跟杜威作一比較，在杜威來說，強調的是一種具脈絡感的理性，思想與行動是整合起來的，必須具實驗的性質，而且屈服在持續性的修正之下，其規則導引的特性被減低，而且隨機性的，那裏存在著創造性發展的可能性；而韋伯反之，會把行動加以去脈絡化，理解成目的理性的行動，最後會變成把行動當成是一種思想上的附屬現象。

他們三個作者對韋伯的看法，跟Schluchter的看法，有著明顯的差異。

五、文化與生活導引

這部分包含了四篇文章，我們可以藉此瞭解韋伯的理解社會



學跟所謂文化科學之間可能的相關性。韋伯的理論的開放性與多面向性，特別凸顯了其文化社會學的面向，他對理念系統與利益狀況之間的關係與衝突的歷史重建工作，不但考慮到不同領域的固有成規性，而且同時也考慮到了特殊發展途徑的基本偶連性。在各種不同的制度化、內化與解釋的過程中，個人生活導引的核心形塑者，在韋伯的宗教社會學裏很明顯地被看出來，所以“文化與生活導引”的課題既是文化社會學的，也是宗教社會學的課題。在這種情形下，Kippenberg的文章，他認為在《經濟與社會》裏面的被韋伯夫人當成宗教社會學的章節，講的並不是韋伯夫人所認為概念的經驗面向的探討，相反的，他是韋伯寫給出版商的信中所謂的“宗教社群”的章節。而在韋伯作品史上對基督新教的研究以及世界諸宗教經濟倫理的比較作品，在很多方面呈現出一種決定性的轉折。在內容上來看，韋伯討論了利益的問題，而且討論宗教取向與經濟日常生活的因果關係；從外在分析上來看，他把他的宗教社會學的認識，當成是西方理性化過程獨特性的啟蒙的基礎性研究計劃，而把“除魅化”當成是一個核心的基本價值，這使韋伯帶來一種典範式的改變，對於當時的“宗教學”產生轉向的作用。此外，他認為“共同體”這個概念對韋伯也很重要，因為他擁有結構與固有成規性，這與整個社會理性化、制度化息息相關，不同類型的共同體具備著不同的文化意義，因此他認為韋伯的宗教行動及其意義指涉，還有他探討宗教與社會階級的關連，成為他比較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的比較倫理的基礎。

Graf則討論韋伯與其海德堡神學家同事 Ernst Troeltsch 兩人之間的同與異，韋伯與後者一生都是好朋友，兩人對基督新教的倫理皆有精彩的研究。韋伯討論現代企業資本主義與宗教的文化意義，從清教徒的心靈以及心志倫理（Gesinnungsethik）的概念或功效倫理（Erfolgsethik）的概念，在海德堡世紀之交的氛圍下，



密集地討論這個問題。因此當時的時代背景對於瞭解他們兩人的學說有其特定的意義。而目前擔任韋伯家鄉的Erfurt大學韋伯學院院長的Joas，在他討論韋伯與人權的文章裏，他認為儘管韋伯作品裏沒有特別討論人權的問題，但是我們可以在韋伯的基礎之上，來探討這個問題，尤其是韋伯跟 Troeltsch 以及另一個法學家Georg Jellinek，他們之間的關係密切，Troeltsch 希望相對於西方的人權傳統，從德意志的歷史思想傳統去建立人權，強調造物主的自我實現，質疑功利主義式的與理性主義式的解釋，而 Joas 則提出了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個是就歷史上來說，到底人權是不是從法國大革命的、反宗教的動機而產生出來的？還是它也有宗教的根源？其次就系統性來看，到底自我實現的心理動機，是不是一個人類的自我超越的結果？或是一個宗教性的形式翻轉，朝向個體的與表現的精神性方向的發展？再者，公法專家Jellinek在1895年的作品《人權與民權的形成》，則提出了重要的線索，因為他很確定地指出人權的想法，與其說是法國大革命反宗教的根源，不如說是立基在基督教的根源之上，這尤其可見於美國的獨立宣言以及北美抗議宗教的自由鬥爭裏顯現出來，而且這位法學家也把對於現代的理解具相當革新的觀念加以相對化，亦即把人權的發生看成是一個過程的部分，亦即看成是理性的、神聖化的一部分過程。對韋伯來說，這種關連似乎是沒有矛盾的，雖然他認為人權的討論是在“理性主義者的脈絡”下感到興趣，但是他覺得在宗教的基礎上，也一樣可以找到這種證據，韋伯進一步去討論在資本主義的擴張與進一步官僚化的過程裏，人權的興起與貫徹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的限制之下，公民的自由與憲法的權力不斷地遭受到強制性的壓力，就好像他研究俄國的情形所看到的，韋伯提出了一個悲觀的時代診斷。韋伯認為，當資本主義從他的宗教根源解放出來後，不再是需要普遍主義式的道德基礎；但是從晚近新的宗教運動，或新的教育的擴張，對於新的市民氛



圍的形成提出了重要的指標作用，這無疑的會把韋伯的悲觀觀點相對化：對人權的信仰發展，其實是跟人格的逐漸增加的神聖化的脈絡趨勢息息相關的。

另外一篇文章是 Müller 的作品，他討論文化與生活導引能否透過工作（勞動，Arbeit）來加以完成？這篇文章檢討工作、天職（Beruf）與召喚（Berufung）在韋伯作品裏扮演的角色，這三角概念在理論上如何限定，對於當代的問題又如何具有分析上的相關性？在探討西方資本主義的形成條件與原因，以及西方現代的獨特性的問題意識之下，作者討論了韋伯學說的獨特性，比較少討論勞動、分工與社會分殊化的關係（這令人想起涂爾幹，因為他是著名的涂爾幹專家），相反地把工作擺在不同的結構關連下加以考量分析。因此工作被放在當時的技術與社會結構之中（勞動團體的面向），放在職業與社會階層等社會結構裏，還有階級與身分團體等的身分結構裏，還有宗教取向以及宗教對於天職、人格與生活導引等等的意義的文化結構裏。在這種情形下，作者認為韋伯對於當代職業倫理的研究、對於勞動團體的研究，以及對於天職、人格與理性的生活導引的相關性的研究，對於當代社會仍然具有相當分析面向的貢獻。換句話說，他在這裏整合了涂爾幹的問題意識與韋伯的問題意識，提供了我們韋伯典範進一步分析的可能性。

六、制度與秩序

這部分是有關宏觀社會學的研究，Schluchter 的得意門生 Schwinn 在他的文章〈全球化的現代中的文化比較〉，他進一步分析了韋伯所認定的現代在西方的發展為何只有在西方出現的問題意識，可以透過另一個觀點來加以補充：其他的文明如何對於



西方的挑戰來加以反應？而其他的抉擇的秩序類型又是怎樣發展出來的？作者提出三個層次來探討這個問題：文化的、程序的與結構的層次。文化的層次可以把現代看成是一個新的軸心時代，而程序的層次可以把現代看成是一個社會變遷的特殊類型，而在結構的層次，可以把他看成是在多數現代社會裏，所存在的不同領域與秩序的分殊化的趨勢。因此，不同文化的比較，就像韋伯當年所做的，越來越需要透過這種分殊化的過程，透過參與者自己來加以補充。不只是經濟的單位，或者是文化都陷入在一個競爭的狀態下，而在國際的“現代性的光譜”找到它具體的表達方式。

第二篇是以色列著名的社會學家 Eisenstadt，他有關多元的現代的制度秩序的文章，也是從所謂韋伯觀點出發，現代呈現了制度的多樣性，在很多新的個人自由之外，也呈現了許多開放性與不確定性，現代文化計劃意味著是一種“確定性特徵的失去”，同樣的現代的政治過程也呈現出多樣的利益與社會秩序的不同觀念，因而產生的鬥爭，對政治作為正當性新定義的鬥爭，所以韋伯的宗教論文集也可以看成是偉大文化的內在動力的研究，不同的文化變成動態性的力量，呈現出不同的自我理解及其特定的理性，歐洲文化的現代要與其他文化相對應競爭，這是現代社會的共同性與差異性的來源。另一位韋伯專家 Breuer 則討論韋伯的政黨社會學與法西斯主義的問題，他探討的是現代性與野蠻之間的可能關連的例子，韋伯的作品對於政黨的分析，尤其是對於一個法西斯的政黨，透過理念型的研究方法，是有其積極貢獻的。以政黨為取向的社會行動，跟以身分團體為取向的社會行動是不同的，因為前者是一個秩序即所謂政黨系統為取向的自由行動。韋伯對於政黨發展，由卡里斯瑪到最後的大眾民主化的階段，其實是具有深入的分析能力的。還有德國社會學會會長 Rehberg 的文章，他討論個人跟制度之間的關係，從《經濟與社會》裏面的第



一章，他看到制度是一個象徵性的秩序，個人以其為取向，而且因而使它穩定化，所以對韋伯來說，這不是一個從確定的秩序出發，而是從一種秩序的主張出發，不是從確定的有效出發，而是從一種有效的訴求出發，於是制度是一個綜合體，綜合了個人與社會結構對於秩序問題的條件，所以研究制度必須要研究社會結構化以及個人的成形化的問題，而制度的比較必須要研究個人在社會秩序下的地位價值以及社會組織中個人推動的力量，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韋伯有關社會學類型的研究仍舊有其特定價值。

七、結語

總而言之，在這本書中，是從多方面來跟韋伯的社會學理論作對話，因此稱之為“韋伯典範”實不為過。海德堡的“韋伯典範”傳奇，似乎歷久彌新，透過韋伯來從事研究，韋伯的典範是一個多面向的典範，從微觀到宏觀，從文化內到跨文化的，從對19、20世紀的分析，到對21世紀的分析，韋伯的社會學研究典範仍然具有它特定的時代意義，這本書所有作者與編者要向我們提出了有力的確證。





社會理論學報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訂購單

真 / 郵寄至: **八方文化創作室 GLOBAL PUBLISHING CO PTE LTD**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屬公司) A Subsidiary of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坡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Tel: +65 6466 5775 Fax: +65 6467 7667 Email: sales@wspc.com.sg

京 中國北京市西城區, 德外大街 4 號 B 座 312 室, 郵編 100011 直綫 / 傳真: +86 10 58581598
電郵: wspbj@wspc.com

每 中國上海灘國際大廈, 黃浦路 99 號 2003 室, 郵編 200080 電話: +86 21 63254982 傳真: +86 21 63254985
電郵: shanghai@worldscientific.com.cn

港 九龍中央郵箱 72482 電話: +852 2771 8791 傳真: +852 2771 8155 電郵: hongkong@worldscientific.com.hk

台 台灣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8 號 5 樓之 6 電話: +886 2 2369 1366 傳真: +886 2 2366 0460
電郵: wsptw@ms13.hinet.net (總代理: 揚智出版社)

西 27 Warren Street, Suite 401-402, Hackensack, NJ 07601, USA Toll-free Tel: 1800 227 7562
Toll-free Fax: 1888 977 2665 Email: sales@wspc.com

英 57, Shelton Street, Covent Garden, London, WC2H 9HE, England Tel: +44 (0) 207836 0888
Fax: +44(0)20 7836 2020 Email: sales@wspc.co.uk

第八卷 Vol. 8 / 2005 • 一年兩期 (春、秋季) • 國際書號 ISSN: 1099-4882

亞太地區 (不包括中、港) 訂戶	<input type="checkbox"/> S\$74
中國大陸訂戶	<input type="checkbox"/> US\$33
歐洲訂戶	<input type="checkbox"/> Eur40
其它地區訂戶 (包括香港) (價格已包括郵費)	<input type="checkbox"/> US\$43

總計:

中國大陸讀者可以
人民幣付款, 收款人
請注明:
八方企業諮詢 (上海)
有限公司

欲知詳情, 請聯絡:
沈先生或張先生
電話: +86 21 63254982
傳真: +86 21 63254985

個人資料 (請用英文書寫)

名: _____ 地址: _____

構: _____ 電話/傳真: _____ 電郵: _____

款方式 (若金額不足 US\$12, 請選用支票, 並附上訂購單。)

支票 / 匯票 金額: _____

(收款人請寫明: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信用卡 (請在相應的方框內打✓)

VISA Card Master Card Am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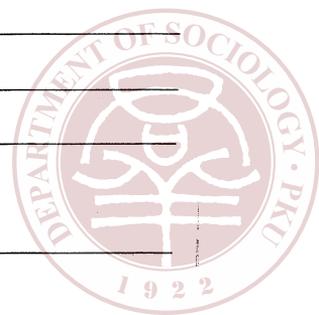
信用卡號碼: _____

有效期限: _____ 持卡人簽名: _____

電話: _____ 傳真: _____

公司/機構訂購 (請附上訂購單)

公司/機構名稱: _____ 訂購單號碼: _____



《社會理論學報》編輯部
八方文化創作室

社會理論學報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一年兩期

主編 林端 謝立中

本期執行主編 林端

出版者 《社會理論學報》編輯部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八方文化創作室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國際書號 1099-4882

版權所有 © 2005 Global Publishing Co. Pte. Ltd.

